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七三期 ——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11a)

【文革一幕】	省长王昭之死	尹曙生
【不堪回首】	汪篋之死	胡 戟
【人物春秋】	江青的亲情世界（下）	杨银禄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文革一幕】

省长王昭之死

• 尹曙生 •

◇ “王青天”青海纠“左”

1958至1961年，青海省以省委第一书记高峰为首的领导班子，在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强制推行“大跃进”。在牧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步走，向共产主义过渡，引起社会极大震动，使青海人民吃尽苦头。1957年底统计青海人口265万，到1962年降到205万，减少60万。减去从劳改单位释放回内地的5万多人，还有50多万。除小部分逃到新疆等地外，至少饿死45万人，占全省人口近五分之一。

当时，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只知道青海问题严重，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并不清楚。1961年春，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被调任青海省委任第二书记兼省长，行前周恩来与其谈话。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杨植霖调任西北局书记，兼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常在西安工作，主持青海党、政日常工作的主要是王昭。

王昭1917年生于河北省平山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冀区党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兼市长、军政

委、兵团政治部主任，1953年由志愿军兵团政治部主任调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同年任公安部副部长，在副部长中是最年轻的。

青海省在“大跃进”年代，不仅经济遭到空前破坏，人民群众死、伤惨重，公检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还运用专政手段残酷镇压毫无过错的人民群众（详见“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人间地狱般的状况，深深地震撼了王昭。1961年5月，他到捕人最多的玉树州，途中被一群妇女拦住车子，下车询问，那些妇女说，他们那里成年男人被捕光了，要求留下“人种”，使王昭非常震惊。他认识到，青海省的问题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问题发生在青海，但是根子在中央。所以，对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班子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改组，对几十名问题特别严重的领导人撤职、降职，对其中少数人作了司法处分。省委常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薛克明是执行左倾路线的急先锋，被开除党籍、公职；公、检、法机关领导大换班，公安厅厅长被降职调到乐都县当了排名最后的副县长；省检察长、法院院长被免职。这些在整风运动中受到处分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反过来借助造反派批斗王昭，文革后，有的人不仅官复原职，还升了官。

王昭单枪匹马到青海，要依靠原省委常委的大多数。省委领导层的大格局基本未变，原来的五位副书记继续留任，只从公安部带来王仲方担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纠“左”只是在系统内部进行整风，主要方式是自我纠正；特别严重的地方，省里派工作组帮助和督促检查。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以左纠左也是存在的，对少数人的处理造成了新的冤案。从1961年6月到1962年6月，复查平反了本省错捕、错判的全部案件，释放了还活着的各类人员17000多人。

由于王昭的到来，解散食堂、采取紧急救援措施，人口大量死亡的状况迅速得到扭转。尽管生活仍然极端困难，每人每天在1961年还吃不到半斤粮，但是不用进食堂，用野菜、树皮加以补充，不至于饿死。如果继续在食堂喝大锅清汤，那就非饿死不可。所以人们发自内心拥护王昭，呼其为“王青天”。

当时，青海农牧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破坏，短时期内难以恢复。王昭通过实际考察，为了调动农、牧民生产积极性，在偏僻农村允许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允许作业组承包一定数量的土地；在牧区允许牧民个人承包喂养牛羊；在城市积极组织生产最迫切需要的生活用品；另外还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请给青海多调拨生产资料 and 商品。到1962年底、1963年初，多数农牧民家里有了铁锅和菜刀，布票由原来每人每年7尺加到15尺，城市居民日用品供应也有了改善。

◇ “死心眼”的王昭

这时，毛泽东要求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1963年秋，王昭亲自挂帅，两位省委副书记参加，从省直机关抽调30多名厅、局干部、300多名普通干部组成“四清”工作团，浩浩荡荡开进离西宁市几十公里的湟中县平安公社开展社教试点。

笔者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公安部，刚刚报到，即因王昭要人，调去青海省公安厅工作。开始第一年的具体工作在复查案件办公室，阅读、整理公安机关（包括劳改、劳教部门）上报的整风运动材料，接触大量血腥、悲惨、荒唐、令人发指的事件。另外，直至1966年，参加全部5期“四清”，目睹运动全过程。

在“四清”工作团动员大会上，王昭按照毛泽东的口径，大谈特谈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大

谈特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必要性。对工作团每一个成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强调要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准搞特殊化，要紧紧依靠贫下中农，通过社教运动，把被地、富、反、坏、右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他规定了严格的八条纪律，工作队员违犯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工作队员不准带吃的、喝的，不准下馆子，违者开除公职，是党员的要开除党籍；和女社员发生两性关系的，以坏分子论处，等等。

没有下去之前，工作队员并不知道农村实际状况，下去之后才知道，农民实在太穷，农村实在太苦了。和农民同住、同劳动问题不大，但是要和农民同吃饭，就意味着挨饿和得浮肿病。王昭以身作则，住在一户最贫困的农民家。早晨吃的是土豆、白开水，中午是发了霉的青稞面馍，晚上是干菜根泡后用水煮，在里面撒一些杂面，成了杂面糊糊，调料只有干辣椒面。对一个患有糖尿病的他来说，这是难以生存的。

公安厅派一位警卫人员跟着王昭，想给他单独弄点吃的，遭到严厉批评。一起下去的那两位省委副书记，只呆了一个多星期，就找借口回西宁，然后干脆住进医院了。死心眼的王昭，身患糖尿病，却硬着头皮，坚持在那里。直到发高烧，才不得不回西宁治病。稍有好转，就又下去。包括他的警卫在内，几个干部经过商量，找各种借口，要王昭每星期回西宁一、二次，以便改善一下生活。三个多月的“四清”结束后，王昭自己和100多名工作队员得了浮肿病。7个工作队员实在饿得受不了，违反纪律偷带食品、或叫家属偷偷送吃食，如饼干、糖果之类，或偷偷到平安镇上买高价食物，被发现后开除党籍或公职。

此后，王昭不遗余力地贯彻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理论，在青海省大搞“四清”运动，积极贯彻西北局指示，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重新补划地主、富农成分（牧区划牧主和富牧成分），大整基层干部，把“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转嫁到基层干部头上。

王昭把开始好转的青海经济再次推向绝境。农村的赤贫他是知道的，亲身经历过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能是身不由己吧。但是，毛泽东要求各个省委都要搞社教试点，而且要向中央报告。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不亲自出马，你王昭带这个头干什么？我一直不理解。他完全有理由住院治疗疾病。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王昭就因患糖尿病在北京治病。他还患有肺气肿等多种疾病。这和他任青海省工作5年多的辛劳有着密切关系。青海除东部农业区海拔在3000米以下外，80%以上地区在海拔4000米以上。王昭跑遍青海，甚至带科技人员到高寒牧区了解地质、矿藏、牧场、草地，研究发展青海省农牧业生产和石油、有色金属、盐湖开采。在那里，气候变化极快，有时在一个上午或下午，就可以经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高原严重缺氧，对病人危害很大。

一次，王昭到玉树，在翻越5600米的巴彦喀拉山时，由于氧气袋里的氧气已经用完，他顿时休克。司机加快速度开车，想在最短时间里翻过山岭到地势较低的地方。山是翻过去了，可是到4000多米的低处，车也翻了。王昭腰部、颈部受伤，后经医院治疗，脖子还是转动不灵，腰不能伸直，这样仍然坚持工作。他是真想改变青海的落后面貌啊！

◇ “四清运动”中王昭的左倾路线

在“四清”运动中，王昭带队来到平安公社，要为今后全省开展社教运动树立样板。王昭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第一个标题就叫做“平安公社不平安”，其中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推行“大跃进”时的种种强迫命令、多吃多占，把群众对“大跃进”说过的牢骚话、小偷小摸行为，都说成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复辟；把部分基层干部在左倾路线逼迫下的违法乱

纪，说成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把个别地主、富农家庭成员的任何行为，说成想反攻倒算，等等。

平安公社、大队、生产队90%的干部被批斗，37人被斗后自杀，19人被逮捕。在对敌斗争阶段，开展了对“五类分子”的群众批斗会。可是，尽管工作组员一再交代怎么说话、怎么批判，积极分子上台后，还是不知说什么。因为“五类分子”早已是“死老虎”，现行破坏活动根本没有，临时编造也编不出来。大会往往冷场。

为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在社教运动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几乎每个工作组都遇到一个难题：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跃进”以来的苦。为了做好准备，有时工作队员要事先导演社员如何上台忆苦思甜，反复教。可是他们一旦上了台，有些说着说着就联系上了“大跃进”，干部如何打他们，他家里的人是怎么饿死的……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不了。忆苦思甜会变成武斗会，有的干部被当场活活打死。据湟中县统计，全县“四清”运动中有349名基层干部自杀。到1966年，青海13个县“四清”运动中，有1700多名干部自杀，99%以上都是生产大队、生产队里的干部，公社、县里的干部有40多人自杀。

按“四清”运动设想，要把农村被坏人篡夺领导权的村干部撤换、改组，把得到群众拥护的好人选出来当干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昭亲自蹲点的那个大队，选出来的党支部书记叫刘××。原来是个有名的懒汉，土改以后没有翻身，娶不起老婆，独身一人生活。工作组进村时，要挑选最贫困的农家住。他家最穷，两间破草房不能住人。还是工作组出钱派人维修，才能住人。靠这样的人来当大队干部，是没有能力领导大队的。后来王昭被捕入狱，他也受到牵连，被多次游街毒打，不久死去。

王昭的“左”还表现在干部退赃和群众分红上。“大跃进”年代，干部为了自己和家人不被饿死，多吃多占，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现在来清算他们累计多吃多占多少粮食，贪污了多少钱，要退赔，数字惊人，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兑现。工作组开始把社员的胃口吊得很高，到实际退赔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退。因为在一个赤贫的农村，干部比社员也好不到哪里去，比社员多吃的粮食不能让他再吐出来。干部家饿死人少，这是事实。但是现在要把“大跃进”时多吃多占的粮食退出来，就意味着断了他们家的活路。很多干部自杀，就是想以死来保全家里那点粮食不被退赔，给家人留条活路。至于家庭财产，也没有什么。至多衣服的补丁少些，锅碗盆勺齐全些，多那么一两件木质家具。有的工作组把刚嫁给干部家的媳妇娘家陪嫁衣物也拿来分红。甚至在一个大队，为一件女灯芯绒褂子（最值钱的一件衣服）分给谁产生矛盾，最后没有办法，用剪刀剪成5块，分给社员。

青海“四清”运动越来越“左”。从1965年开始，在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积极倡导下，又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补划“漏划”的地主、富农。这次跟“大跃进”时不同的是，只组织群众进行所谓“说理斗争”，很少逮捕法办。到1966年，补划、补定了1万多地主、富农成分和地主、富农分子，几乎全是错的。1961年的“王青天”到哪里去了？当时的王昭和此时的王昭，判若两人。

“四清”运动又一次在青海把“左”倾路线发展到极致。90%以上的基层干部在运动中被打，被刑讯逼供，家属受牵连。四分之一的脱产干部被开除，60%的党员被清除出党，90%的公社书记被撤换。由于“大跃进”造成的悲惨局面人们记忆犹新，把所有的账都算在这些基层干部身上。批斗干部的大会比土改时批斗地主、恶霸还要厉害。尽管有时工作组也强调不准搞武斗，但是，群众往往不听。因为每个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有饿死的人，少则几人，多

则十几人、几十人。这些被饿死的人，都和干部不顾人民死活有关。有的甚至是被干部整死、打死，或送到公安局死在监狱、劳改队的。群众有满腔怒火，一旦被点燃起来，什么说教也没有用。另一方面，这些干部也有自己的苦衷：当初不那样干，也生命难保……此时的王昭同样是如此。王昭不这样干，自有张昭、李昭会干。

◇ 接待邓小平留下祸患

1966年3月，邓小平率领薄一波、刘澜涛、杨成武、贾拓夫等人到青海视察，主要是到221厂（核武器制造、实验基地）。

为了接待邓小平，王昭成立专门的班子，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每顿饭吃什么，都经过精心安排。比如事先指示玉树军分区派两个班的兵力到高山打雪鸡。雪鸡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上，以高山雪莲为主要食物，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他知道有人爱吃狗肉，于是公安厅将一只警犬宰杀。为了首长购物，他特地从全省各地调来贵重野生皮毛。邓小平原来是不准备住在西宁市里，而住在专列火车上的。可是王昭多方请求，要他住到高峰当第一书记时为毛泽东盖的行宫——胜利公园宾馆（毛泽东从未到过青海），并接见处以上干部，和他们合影留念。邓小平见盛情难却，住到了胜利公园宾馆。公安厅为确保安全，将宾馆服务人员完全换成公安人员，炊事人员也由公安人员在一旁密切监视。对每一个房间，每一件家具的摆放，王昭都要亲自检查。为邓小平住的房间那张床的摆放位置，就先后改了三次。为了突出政治，房间里摆什么书他也煞费苦心，最后决定放毛选四卷和《毛主席语录》。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著作，只摆放了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就在王昭忙活的时候，毛泽东在上海、杭州召开没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紧锣密鼓策划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名义上是请假到西北视察“大三线”建设，他在青海视察，极少说话，似乎闷闷不乐，忧心忡忡。我作为公安厅临时抽到宾馆的服务人员，亲眼目睹了邓小平严肃的面孔。王昭代表省委的汇报，是在由西宁开往位于海晏县的221厂专列上进行的。邓小平很少说话，可见心情之沉重。给他准备的雪鸡倒是吃了，并赞美味道不错。这里要讲一段小插曲：

邓小平到宾馆住下，不愿意走动。而薄一波在刘澜涛等陪同下到50公里外的塔尔寺参观，由于道路不好，耽误了时间，没有按时回来。可是总书记不能不按时吃饭，于是就先开饭。领导虽然不多，但是随员不少，整整四桌。雪鸡好吃，吃完再上。一共只打了3只雪鸡，炊事员不知道有人到塔尔寺去了，将做好的雪鸡统统上了。等薄一波等从塔尔寺回来，另开一桌饭时，王昭见没上雪鸡，几次大声喊：快上雪鸡！可是哪里还有？负责接待的省委办公厅主任马万里悄悄告诉王昭，雪鸡吃完了。还是薄一波解了围，笑着说：总书记代表我们尝了鲜就行了，我们吃狗肉。这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给首长准备的贵重皮毛等土特产品，邓小平根本没有心思买，倒是北京来的工作人员买了一点。

邓小平一行离开青海，王昭累病了，到北京治病。红卫兵起来造反，中共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叫王昭不要回青海，安心在北京治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可是王昭听说省委被造反派弄得不能办公，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能让辛辛苦苦得来的成果毁于一旦，不能让青海人民再受苦难。于是，不听善意劝阻，回到西宁。他经常和冲击省委的红卫兵、造反派辩论，经常被推打，身上有很多伤。但是这时，还没有人敢公开对他进行武斗。

王昭“执迷不悟”，天天上班，经常和红卫兵在省委大楼前辩论。那些在1961年、1962年整风运动中受到过直接或间接处分的人，看到形势对王昭不利，给造反派出谋划策，提供内部机密，提供打倒王昭的“炮弹”。包括接待邓小平的详细情况，都在大字报上贴出来了，

说王昭为了接待邓小平一行，花了几万元，光招待吃饭费就花了1万多元，而每人只交了1.65元，加起来才几百元。尤其是派2个班兵力打猎10天，战士在高山上非常辛苦，有的人冻坏手脚。为了招待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和61个“叛徒”集团中的薄一波、刘澜涛，如此大动干戈，不惜花费民脂民膏，这说明王昭本人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大字报还说他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著作放在一起，供邓小平阅读，更是罪该万死！

这些大字报对王昭非常不利。随着刘、邓被公开批判，造反派把王昭关押起来，轮番批斗。省委某些副书记、常委，则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王昭身上，自己经常出现在批斗王昭的主席台上坐着。这些“大跃进”时期的“左”派人物，摇身一变，又成了支持造反派的革命领导干部。

◇ 出逃与自投罗网

王昭被造反派关在省委汽车房里。一天晚上，他起来小便，意外跌倒，摔断胳膊。造反派不让住院治疗，只扎上绷带。同情他的警卫员，知道如果不及早把骨头接好，将会造成残废。于是一天深夜，砸开汽车房的锁，将王昭从里面接出来，用苏联嘎斯六九吉普车经大通、祁连，翻越祁连山脉，到达甘肃张掖，然后坐火车到达洛阳。王昭改名换姓，住进洛阳骨科医院治疗。

王昭突然失踪，造反派暴跳如雷，派人到处搜捕。在北京王昭家周围有人日夜守候，结果都没有发现踪影。将王昭转移到洛阳的警卫员安排得非常周到，如果王昭安心养病，是平安无事的。可是，他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不了解，存在幻想，以为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很快就会过去。可是他想错了，等待他的将是灭顶之灾。

1967年春天，青海两大派群众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捍卫队”）和八·一八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八·一八”）为了争夺《青海日报》控制权，展开激烈斗争。2月23日，守卫在报社周围、防止武斗的部队，突然和“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发生冲突，开枪冲进报社，当场打死179人，打伤1000多人。这还不算，几天之内，驻军部队在公、检、法机关的配合下，在全市搜捕“八·一八”造反派骨干成员几千人。省、市监狱关不下，就临时关在一些机关礼堂。“八·一八”的几个头目，除一号头目马继文（汽车场工人）身中五弹、生命垂危，军管会指示为了保留“活证据”，必须全力抢救，保住了性命，其余头目全部被捕。“八·一八”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取缔、解散。在一个月时间里，“捍卫队”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对被抓起来的“八·一八”骨干成员，采用各种刑讯逼供手段，加深了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相互仇恨，为“八·一八”被平反以后的报复埋下隐患。

1967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把“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把赵永夫、张晓川定为这一事件的策划者，说王昭和这一事件直接有关。赵永夫是青海省军区司令，张晓川是总后勤部205部队司令兼政委。他们与之有直接关系可以理解，因为开枪的部队是赵、张管的部队。事件发生后抓捕、审讯几千名“八·一八”造反派群众，是在他们领导下进行的。他们难免为这一惨案承担责任。尽管他们始终不承认下令开枪，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曾经下令开枪。可是王昭和“二·二三事件”确实没有任何关系。他在洛阳治病，只有他的警卫员知道，任何造反派和他都没有联系，而且他还是两大派群众组织都要打倒、都要揪斗的对象。可是这一颠倒黑白的决定报纸上登了，广播上播了。王昭听到广播后十分生气、不满。他要到北京找中央、找毛泽东、找周恩来说明情况。

王昭太天真了。别人劝他不能去，“八·一八”死、伤了那么多人，到处找你，落到他们手里还有好日子过吗？光棍不吃眼前亏，不能自投罗网。可是他不听，骨伤还没有治好就回到北

京家中。公安部造反派马上把他拘禁起来，并通知“八·一八”。青海省造反派如获至宝，马上派人到北京揪斗王昭。

◇ 周恩来发话与王昭被“左”扼杀

周恩来在1967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为八一八平反时，把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宣布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王昭被带走时，大声对总理说：我和他们（指赵永夫、张晓川）没有关系！但是没有人理睬。造反派要求把王昭带回青海批判，周恩来说：“你们把王昭带回青海批斗可以。但是，只能文斗，不能武斗；要烧而不焦，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1961年王昭到青海工作前，是周恩来找他谈的话。现在周恩来这样说，让他欲哭无泪。为什么不能亲自接见王昭，直接了解情况呢？王昭是满怀信心到北京找周恩来为自己辩护的，否则他会听人劝告在洛阳继续秘密治病。

王昭被押回青海时，“八·一八”已经成了得到中央肯定的造反派组织。那些死、伤的造反派家属、亲人怀着强烈的复仇情绪对王昭进行批斗。我不愿意具体描述那种法西斯暴行，只举一例。一次，王昭被吊在解放牌卡车上游街示众，负责押运的6位造反派将吸剩的烟头从他衣领里丢进去，一共丢下21颗烟头，王昭的脊梁被烧了几十个血泡。

几个月后，王昭被正式逮捕，关进公安厅监狱。他本有多种疾病，胳膊摔断还没有治好，监狱生活条件极差，马上就病倒了。他还怀着希望，不断给周恩来写信，为自己申冤。我不知道周恩来是否收到王昭的信，既然他亲自批准正式逮捕王昭，自有原因。王昭孜孜不倦地写信，共有12封之多。

王昭对专案组指控他是罗瑞卿“死党”一直不承认，他在给总理的信中说，他们只是工作关系，没有别的关系；1957年反右派时，罗瑞卿在公安部党组会议上说，“公安部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在中直机关是一个大部，在反右派中要起带头作用”，于是划了63个右派，还有不少人被划为右倾，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他作为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是有不同看法的，因为到公安部工作的人都受到过严格审查，政治历史没有问题，而被划右派的人都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给领导提些意见，就被打成右派，这样做是不公道的。可是，罗瑞卿的权威使他无法阻止这样做，他为此一直感到有愧。

此时青海省实行军管，省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曾征是省军区副司令，王昭专案组组长。王昭哪里知道，他1961年到青海纠正“大跃进”、平息叛乱中的左倾错误，不仅得罪了一大批地方上的大、小官员，而且也得罪了部队上的一些人。平息1958年武装叛乱，青海省军区司令是孙光，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孙光在平乱中犯严重错误，被降职调到陕西省军区担任副职。一些军方人士不会忘记是王昭1961年到青海来整了他们。

公安厅看守所和公安厅劳改局职工医院相隔只有几百米。1970年，王昭病重。看守所向军管会报告，要求把他送到医院治疗，并通知医院准备好病房。军管会迟迟不作答复。直到王昭病情加重，不抢救就会死，看守所医生感到责任重大，不得不亲自到军管会直接给领导汇报。适逢几个负责人在打扑克，医生站在一旁，战战兢兢地说：“王昭大吐血，我们没有办法治疗，如果不马上送医院抢救，今天晚上恐怕过不去。”军管会的一位副主任一面打扑克，一面冷冷地说：“王昭不是省委书记、不是省长，是经过中央批准逮捕的犯人，是杀害革命造反派的凶手，你为什么那么同情他？你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造反派们的血难道就要白流吗？！”

医生一句也说不出来，只好走了。他知道自己已经尽到责任，王昭死了和他无关。第二天早晨，看守员打开王昭监房，发现他已死。地上有一摊血，王昭手里还攥着没有写完的信。信上写着：

“周总理：这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我知道这封信还没有到你手里时（也许永远也到不了你手里），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你把我派到青海来纠正青海省委错误路线给青海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做了，使青海的工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提高，平反了大批冤案，有效地制止了非正常死亡，民心也比较顺，只要继续努力，青海的落后面貌是可以改变的。我知道有很多工作还没有做好，这几年省委和我把主要精力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对工农业生产抓得不是很紧，那是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反修防修，使中国永远不改变颜色。我一直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竭尽全力在做工作，刚来青海时，我身体非常健康，你找我谈话时，不是还赞扬我的身体好、到青海工作没有问题吗？可我现在一身是病。造反派说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死党，说我是‘二·二三’事件的幕后策划者，都不是事实。我和罗瑞卿在公安部是工作关系，他到总参当参谋长后，我们很少接触，只是1962年中央在兰州召开西北民族工作座谈会，罗瑞卿到西北视察，到会听取对军民关系的意见时，我对1958年至1959年军队在青海平息反革命武装叛乱时，不按中央政策办事，残酷虐待俘虏和滥杀无辜、严重伤害民族感情谈了看法，对负有直接责任的省军区司令孙光处理太轻提过意见。罗瑞卿表示，我的意见很好，将认真研究。我是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光明正大提意见，没有和罗瑞卿有私下往来，怎么就是罗瑞卿死党呢？‘二·二三’事件前20多天，我就偷着离开青海，到洛阳治病，两派造反组织都要斗争我，到处找我没有找到，我直到中央决定为‘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平反，才知道青海发生了‘二·二三’事件，打死打伤那么多人。中央决定把我和‘二·二三’事件联系起来是不正确的。总理，你可能听过青海省某些人不实的汇报，才同意对我批斗、逮捕的吧……”。

军管会做出决定：王昭死亡，严格保密，不得外传，以在西宁市东关大街上发现的无名尸体为名送火葬场火化，骨灰暂存火葬场。1958到1960年，青海对于死亡犯人，不通知其在外地的家属，以无名尸体处理。如今，王昭也是这个待遇。他可以说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夫人在北京工作，文革中受尽折磨，王死后抑郁而终。唯一的女儿饱受刺激，得了精神病。

军管会不敢不向中央报告，但谎说王昭住在医院，经过多方抢救无效死亡。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青海没有按他的指示保护好王昭的人身安全。可这对于死者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不过对关在监狱里的其他受害者却大有好处。第一个受益者就是被王昭从公安部要到青海担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主管政法工作的王仲方。

王仲方做了罗瑞卿十年政治秘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牵连最先受到冲击，早于王昭几个月，经周恩来批准被捕入狱。王昭和王仲方是造反派要打倒的省委主要对象，也是被批斗得最残酷的。而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和副书记、常委们，基本没有什么触动。从这里可以看出，王昭到青海后纠“左”确实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时机一到，终于遭到报复。

王昭死后不久，看守所里来了几位医生，非常仔细地给王仲方检查身体，给他打针，服一些平时见不到的好药。饮食上照顾尤佳，派专人做好饭、好菜，王仲方称之为“吃小灶”（文革前，厅以上干部有专门供应的副食品，专人做饭吃，叫做小灶；另外还有特殊的商品供应）。这才使身体每况愈下的他被关押5年后，还能活着走出监狱。在回忆录《炼狱》中，王仲方说：“我感谢王昭在天之灵对我的关怀，要不是他的死引起中央领导注意，改善监管条件，我也不会活着走出监狱。我强烈痛恨造反派对王昭和我的迫害。”

1979年，王昭得到彻底平反。家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火葬场找到王昭骨灰，接到

北京。他的战友、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王昭平反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他饱含深情和眼泪迎接战友的骨灰，陪同送到北京八宝山公墓一室安放。（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 《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  
【不堪回首】

汪篪之死

• 胡 戟 •

中国历史上的新王朝，在经历了改朝换代的革命后，建立初始大凡会有一段喘息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以求复苏。一般要七八十年，经济才有一个比较好的局面。1949年以后，曾经设计过的新民主主义方略被搁置批判，一直延续着革命时代的激情折腾。结果呢，到“文革”收场之时，GDP仍徘徊在年人均50美元的极度贫困水平，近30年间一无长进，国民经济处在崩溃边缘。

其间，1958年在全民大跃进的狂热中开始了一场史学革命的鼓噪，但随之而来的全民饥饿，使众多史学家有意无意将眼光放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上，对与民休息政策的特别推崇，自觉不自觉地总结文景、贞观等治世的经验，不无寄托对改变折腾生产关系和全民大炼钢铁、全国学大寨（一位美国人当时就断言：全国学大寨，全国没饭吃）的幻想。

然而那是一个阶级斗争史观普遍流行的年代，权威的说法就是毛泽东的那句：“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1页）经典的依据是《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另一句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给奥·倍倍儿、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页）所以阶级斗争史观是不容置疑的，大家也是深信不疑的。比如“文革”后期的1975年，北大历史系请工农兵一起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时，我也被找去参加。讨论编书的指导思想时，有人提出要贯彻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两条红线，在场的我到底是已有七八年当产业工人的经历，说起话来比田余庆、李培浩等老师们有底气，直截了当地表示了反对意见，认为按照经典作家的论述，历史只能有阶级斗争一条红线，不能再并列一条别的红线。总免不了在阶级斗争史观的框框里说事，现在想来还是有点可笑。

关于让步政策论的争论，无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双方也都是在承认阶级斗争史观的共同前提下，做你死我活的纠缠。

1959年我进北大历史系读书，中国通史课程用的就是正在编写中的《中国史纲要》的铅印讲义。翦伯赞先生和老师们努力用让步政策论来诠释阶级斗争、农民战争如何推动了历史前进。翦伯赞先生是最早表述这一观点的，他于1951年发表的《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中说：“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生产力又有连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这一论述被概括成这样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公式：农民战争——统治阶级的让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多年追随陈寅恪先生的汪篑，1947年后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20年，50年代初学校特别选派他去中央党校学习两年理论，于是有党内红色专家之称。1953年5月30日在《光明日报》的《史学》专刊上，他以季铿之名发表了题为《唐太宗“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一文，由唐初实行“均田制”，论证唐太宗“采取了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因而出现了“贞观之治”。时间上只略晚于前述翦伯赞先生的文章。

如何解释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有没有实行过让步政策，这本是一个极普通的学术见解；编教材和写文章，本来是学术上的事情，应该自由地进行讨论。马克思在《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中，早就表示了对学术自由原则的赞美和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憎恶，主张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最恶劣的”。可是在我们这里，竟煽起群众运动，用批斗的方法，将扼杀学术自由的书报检查发展到极致，酿成了屈辱人格、夺人性命的许多悲剧。于是在“文革”时期，主张让步政策论的汪篑教授，先于翦伯赞先生罹难。

这里可以顺便说一下，其实让步政策论的始作俑者应该是陈伯达，三四十年代他的文章里就有类似说法。“文革”开始后不久发现的这个秘密上报到了戚本禹那里。当时的陈伯达是中央第五号人物、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被宣布为是党内最好的理论家，不允许炮打的。戚本禹当即下令封锁材料，不得外泄。如果他有先储备起来，将来当做炮弹抛出来的想法，在那时也是不足为怪的。可仅此一事就可见“文革”黑手们搞大批判的齷齪不公。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文章，猛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清官论，掀起“文革”风暴后，在史学界，则是翦伯赞和与他“志同道合”的人首当其冲，让步政策论和清官论一样成为狂轰滥炸的靶子。这时，一位30岁的年轻人孙达人对让步政策论的批判，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当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也说在农民战争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定于一尊”的传统，使这个本可以讨论的问题，再无可以质疑的余地。以前没有听陈先生的话远离政治的汪先生，此时天真地还想争鸣，这是他又一致命的错误，狠狠撞上了南墙。

对“让步政策”论的批判立即升级，汪篑先生很快被抛出来。1966年3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丘易的文章《从“贞观之治”看“让步政策”论的谬误》，点名批判上引了1953年汪篑先生文章：“从《贞观政要》中大量征引一些出自李世民及其臣僚之口的话……来证明李世民‘确实’很懂得‘为君之道’，很懂得君主和老百姓的关系，是个‘明智之主’。因此他才采取了‘让步政策’的措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出现了‘贞观之治’。”因为引用了《贞观政要》的材料，便被批为“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是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惯技，而且即使是在资产阶级的史学中，也是最下乘的方法”。

丘易上纲上线的结论是：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之所以错误，不能简单地归之于认识问题。从实质上看，这是持这种看法的人的立场问题、观点问题；是从历史研究中抽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宣扬反动统治阶级的“惠政”“德治”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从而达到否定人民群众的革命作用的这样一个大问题。直到目前有人对此提出批评，他们还哓哓争辩，这能说是一个简单的一时认识不清的问题？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出现的一股取消阶级斗争、取消革命、宣扬阶级敌人的“明智”的思潮在我们史学领域中的反映。

丘易说要“清除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他自己则完全不加论证地这样论证赋役剥削的程度一代比一代加重：“以汉、唐、明、清而论，一般说来，大抵唐代比汉代增加了三倍，明代比唐代增加了七倍，至于清代，则又甚于明代。”笔者曾经分析过历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

的情况：两千年间徘徊在勉强维持温饱线上，没能做到“耕三余一”。真不知道汉代的“十一之税”已经是“此农夫之所以常困，有不劝之心”，明代重于汉代二十倍的田赋户调从何而来！

丘文发表的背景是一周前的3月16日《新建设》编辑部召开的，邀请北京和外地在京的部分史学界人士参加的关于“让步政策”问题的座谈会。汪篋先生与会，并作了长篇发言。与会的人告诉我，那天先生的情绪处在“亢奋”状态，强烈为“让步政策”论辩护。结果引来了丘易一周后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上述文章。当时这样的点名都是要经过上面批准或授意的，公开点名也就是抛出来批判打倒之意。

《新建设》同时在3月号上刊出《关于“让步政策”问题的笔谈》，所收的五篇文章中有与会者整理的发言稿，但没有汪先生的。从一面倒的批判声中，特别是上纲上线的很重分量的批判话语中，可见座谈会火药味之重。诸如：

所谓“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等，都是古代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言辞，为什么今天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仍会全盘接受呢？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大多数属于士大夫阶层，新中国成立后养尊处优，士大夫的思想感情根本没动（甚至更发展）……口头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感情、生活——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他们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硬把农民生产积极性所造成的繁荣，说成是出于统治阶级“让步政策”的恩赐，这真是极大的污蔑。……这种论点是极端反动的，危险的。

在中国历史中，无论哪个朝代，在扑灭农民起义以后，头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恢复秩序、重整纪纲。他们所要的“秩序”和“纪纲”都是为维护封建生产关系服务的。他们首先要作的就是要加强封建生产关系。这是对于农民的反攻，怎么说是让步？……其间即使真有一点小恩小惠，那也是不折不扣的欺骗，怎说是让步？

我同意同志们说的：在中国封建时代没有什么“让步政策”，所谓“让步政策”是封建统治阶级整个统治手法中软的一手，和硬的一手交替为用，是捣乱失败后的再捣乱。问题不在于封建统治政权会不会和有没有让步，而在于以什么立场和观点来看待这种现象。是加以批判分析，揭露它的虚假性和欺骗性，还是无批判地加以赞扬和歌颂，就成为根本性的问题了。在我们看来，所谓“让步”就是掠夺，所谓“让步政策”，就是掠夺政策，或者说掠夺的一种手法，一种策略。只有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才能说这是“让步政策”。……必须声明，作者本人原来也是“让步政策”论者，通过最近一段时间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和在同志们的帮助与启发下，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决心阵前起义，向真理投降。

记得在那数月前，“让步政策”论问题刚提出来的时候，我和汪先生有过讨论。他的见解在上课时反复说过，所以主要是听我的意见。我举布列斯特和约等一些例子说明，让步是政治斗争各方都会用到的策略，目的是换取对方的让步，当时我还能说出经典作家关于“让步”的论述。但是我以为，用“让步政策”来概括统治阶级一个时期的总政策是对被统治阶级的让步，就不合适了。对立的阶级之间，不可能是全面让步。而如果新的统治者不让步，那农民不是白起义了？印象很深的是汪先生当时的表情，听我讲时没有反驳，我讲完后，他盯着我看了许久，还是一言不发。这和我们以前讨论九评文章时他侃侃而谈的情景大不相同，大概是心境不同了吧。在《新建设》杂志的座谈会上，他那样亢奋的表现，我听到时有些意外，又是在意料之中。执著寻求阶级斗争如何推动历史前进答案的他，找不到让步政策论以外的解释，就只好一条道走到黑了。

座谈会之后，丘易的文章和笔谈迅速出笼。3月25日，戚本禹、林杰、阎长贵在《红旗》杂志第四期刊登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见报，接过“是‘让步政策’还是

反攻倒算？”的问题继续批判，上纲到“史学界出现了一股反对史学革命的逆流”，“这是现在的阶级斗争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从座谈会到戚本禹等这篇文章，那黑色的十日，风声鹤唳，汪先生亢奋的一席谈，成为他人生的绝响。从此再没有他说话辩解的机会，他那被反右倾摧垮的孱弱的身体，也再没有气力抗争了。

6月1日广播曹轶欧策划的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政治赌博中的康生高兴地说，他也新中国成立了。“文革”的灾难真正降临全中国大地。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司马洪涛的文章《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说1960～1962年在国内外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他邀请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兼所谓“学者”，着手编写《中国史纲要》，“这部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也是6月1日这天，《光明日报》发表题为《翦伯赞是怎样积极卖身投靠蒋家王朝的》的文章。仅隔一天，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称：“他们叫嚷反动阶级的所谓‘让步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一笔抹杀，他们歌颂的，只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帝王将相。他们是史学界里的保皇党。”“这些‘权威’，有的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的堕落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边缘。”

这些是充斥在汪篪先生耳中的最后的声音。就在那之后两三天，他便自杀了，成为“文革”中北大第一个自杀的教授。在全国他不是最早的，——毛泽东的秘书，极有天赋的田家英已早他几天自杀身亡。

吴宗国教授见告，促使汪先生自杀的，比那总还是学术理论的“让步政策”论更严重的是《魏征传》。我俩都记得那是上面直接布置的一项任务，具体说，是中宣部陆定一急要的书，别人写了，交给他审稿，汪先生还翻给我看过他补的大事记。后来我写《隋炀帝传》，就学他将时事大事和传主的事迹对照起来列表，也写了大事记。汪先生神秘地说那书出的速度快得惊人，他交稿后仅一个星期，书就完成排版、三校、终审、印刷、装订的全套程序，进新华书店了。那是为赶在一次中央会议前出版，鼓吹魏征精神，矛头向上，不言自明。到这时，1966年的3、4月间，已经向国内外公开点以彭真为首的、手下有吴晗的北京市委，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加上更被点为“阎王殿”的中宣部陆定一等，撮合成“彭陆罗杨”反党集团。《魏征传》会把参与者拉进去，一旦成为上了黑线的人物，罪行就远大于弄弄“让步政策”论的反动学术权威了。看清楚没有出路的汪先生，没怎么犹豫就选择了离开人世。服药后数日，6月10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应该就是在他服下安眠药弥留之际，历史系在体育馆开始揪斗老师，只要被喊到名字的老师，不由分说就揪上去低头挨批斗。我记得很清楚，周一良先生被揪后不屈地高昂着头，眼里冒着火，那是我此生唯一一次见到的闪烁着怒火的眼睛。可是第二天，周先生写了一张大字报，检讨自己对抗群众运动的态度。

6月18日，在我住的38楼进门的台阶上，设了斗鬼台，在后面楼上巨幅“红色恐怖万岁”横幅衬托下，好多系的老师一个个被揪上台，抹了黑脸批斗。历史系的总支书记许师谦也被揪上去，当众批斗挨揍，他那时已中风，下来后，摸着墙角一点点蹭着往家走，谁都不敢上去搀扶一把。我同班同学赵德教，毕业后留在系里当团委书记，那天也被揪上台，抹了黑脸。我怕他想不开，没等揪斗人散，就去学校南大门里的大概是19楼里楼梯旁等他。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满脸黑黑的，很沮丧，见了我也不抬头。我悄悄对他说了一句：“大家都了解你，别想不开。”怕人看见，没敢再多说什么，就赶快离开了。二十年以后，他在河南新乡师院当系主任，有意要我去他那里任教，大概是还记得我当天的那一句话吧。

说这些是想讲，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回想起来，汪先生看到没有希望时，不等凌辱加身就走了，是明智的。反正他也是熬不过来的，不如走早些，少些痛苦。近年我多方打听先生有无

遗嘱留下一档案里没有，吴先生不知道，连他的儿子汪安也不知道有遗嘱。那他是无言地走的，他还能说什么。

我深知汪先生是那样热爱历史，热爱教学，他曾和我说，以后一起可以做四件事：一是写中国通史，但是这要四代人才能完成；二是写隋唐史；三是注新旧唐书；四是分门别类归纳整理隋唐历史资料，加以诠释。他最想做的是最后一件事，为隋唐史研究做好基础工作。他一向下笔很谨慎，不轻易写东西，饱学的他发表的文章还不多。土地制度研究、唐代党争史……，他有多少书多少文章要写啊，可是都抛下走了。写这样的文字，手里的笔实在是太沉重了，沉重到心脏难以承受。但愿所有跟我学习隋唐史的学生，我的已经在北大历史系读完隋唐史博士的女儿，和已经出生的希望未来也接班做隋唐史的可爱外孙女，将来再不用带着愤怒流着眼泪写这样沉重的文字；但愿他们再不会有我没能活下去的老师汪篒先生，以及没能工作下去的老师陈寅恪先生这些祖师们的噩梦。谁和我一起来祈祷呢？

□ 《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期

~~~~~

【人物春秋】

江青的亲情世界（下）

• 杨银禄 •

◇ 江青与李敏

李敏，1937年冬生于陕西延安（为贺子珍所生），1940年前往莫斯科，随母亲贺子珍一起生活。第二年，德国入侵苏联，她们母女的生活条件变得异常艰苦。1949年春夏之交，李敏随母亲回国，暂住沈阳。同年由姨母贺怡带领，重新回到父亲毛泽东身边。

李敏的中学时代，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度过的。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考取了北师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和原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的儿子孔令华结了婚。一年后，李敏生了个男孩，取名孔继宁。毛主席非常高兴，经常抱抱、亲亲可爱的小外孙。江青却对李敏一家十分冷淡，还经常借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中南海。毛主席不想让他们离得太远，李敏和孔令华商量后，先搬到中南海内较为偏僻的一栋平房居住。住了段时间，江青还是经常找麻烦。于是，李敏、孔令华带着孩子搬出了中南海。搬出去以后，根据江青的指示，他们出入中南海的证件被收回。从那以后，李敏想要进入中南海就很困难了。

据彬子编的《毛泽东的感情世界》一书记载：“‘文革’初期，李敏在国防科委院校局工作，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李敏虽读过父亲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但对这场运动并不理解。她对‘造反派’说：‘人各有志，你们造反未必我也要造反，不造反就有罪，这是什么道理？’于是，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李敏，开她的批斗会，进而将她关押五个月之久，教育战线在运动中首当其冲，深受破坏。被江青封为‘四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说李敏不是江青生的，孔令华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扬言一定把他们从毛主席身边挖掉。韩爱晶在大闹北航的同时，还把手伸向国防科委机关，将在长征途中打断一条腿的钟赤兵副主任拉到北航大会批斗。李敏、孔令华觉得这是江青一伙在捣鬼，决定去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

“经过一番周折，李敏终于到了毛泽东的住处。然而，事有凑巧，她一进门，便碰上了江青。得意一时的江青，一眼瞅见李敏，就大声地挖苦她：‘小保皇回来了呀！现在正搞运动，回来干什么？想摸底呀？’”“江青挖苦李敏的话，毛泽东听得真切，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门口，

招呼李敏说：‘当小保皇有什么关系。回来摸底光明正大，搞运动不准女儿见父亲，岂有此理！’他把李敏拉到屋里，仔细听取了李敏反映的情况。他对批斗钟赤兵的行为明确表示反对，说：‘钟赤兵是好人，是打仗出来的，是有功的。’并要求李敏回去传达。这话后来有效地保护了钟赤兵。”

“从毛泽东患病到去世，李敏总共才见了爸爸三次面。第一次是她在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毛泽东病重，让李敏去看他。等李敏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让她看一眼，就让她走，说：‘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去吧。’李敏不肯走，说：‘这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呆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江青的话又冷又硬。‘你要这样，以后再也不让你来看了。’”“李敏仍然不肯走，她气愤极了：‘我看爸爸还要你让吗？’”“果然，从此以后，李敏再也听不到爸爸的消息了，没有任何人告诉她毛主席病况如何。她曾经到中南海门口去过一次，请求会见，但没有获准。”“李敏第二次见爸爸，那是她看到中央一个文件中，谈到毛泽东的病情以后，她不顾一切，立即到中南海门口求见，这次她倒是进去了，见到了爸爸。毛泽东仰卧在床上，疾病折磨着他，面容憔悴，声音微弱，但神情十分清醒。他见到李敏站在床前，拉住李敏的手说：‘娇娇，你来看我了。’”“李敏点点头。”“过了几天，李敏接到中办的电话，让她去看毛泽东。中办派来的汽车把她接进了中南海。她以为父亲已经转危为安了，没有想到的是爸爸已经离开人世，输氧的罩子已经撤了，她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父亲去世了，李敏要求为爸爸守灵，江青不答应，没有办法，她只得一连几天排队，随着首都瞻仰毛泽东遗容的人群进入爸爸的灵堂，肃立在那里，向爸爸最后致意。”

对于彬子的叙述，我进行过详细考察，是比较真实的。

1971年8月上旬，江青在青岛休息。有一天，她在那里见到李敏后对我说：“李敏这个孩子看起来文静贤惠，对我毕恭毕敬的，很少说话，但她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我曾经批评过她站错了队，她不但不服，还到主席那里告我的状。国防科委有个叫钟赤兵的高级干部，这个人恨我，反对中央文革，李敏偏偏要保他，她还鼓励主席保他，她这样做明明是对我来的嘛！我说她是个小保皇派，她仗着有主席的支持，竟敢向我拧脖子，厉害得很哪！孔令华也不听我的话，难哪！我们这个家庭情况很复杂，我和主席家的人是很难相处的。李敏就是其中的一个。”

◇ 江青与李讷

李讷1940年8月3日生于延安（为江青所生）。江青不止一次跟工作人员说：“共产党员只有工作、工作，不应该生孩子，生孩子是党外人士的事。我生下李讷就是一个失误。我怀她的时候就不想要她，可是主席喜欢小孩子，我也只好生下她了。”

在战争环境中，居住地点不定，生活很艰苦，李讷六七岁还不能接受正规教育，只有保育员教她识字，到西柏坡才开始上小学。进京后到万寿路育英小学插班读四年级。李讷聪明伶俐，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53年，考入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1959年考进北大历史系。1960年困难时期，由于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大病一场，1961年休学一年，1965年才大学毕业。

1965年，李讷被分到解放军报社当编辑，第二年当了解放军报社总编（当时李讷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编者注），那时李讷才26岁。“文革”期间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复杂，《解放军报》是军队中的党报，地位十分重要。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担任如此重要的领导职务，不但工作繁忙，还要参加政治斗争，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应付江青的政治需要，其难度可想而知。李讷精神高度紧张，体质明显下降，吃不下饭，即使每天睡觉前吃大量的安眠药，仍然难以入睡。

我是1967年10月初调到江青那里工作的。那时，江青住在钓鱼台11号楼，李讷也住在那里，她的宿舍与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只有一墙之隔。我比她大两岁，她经常叫我“杨大哥”。她对我们工作人员比较尊重。有一次，她听她妈叫我“小杨”，就开玩笑地叫我“小杨”，她妈批评她说：“肖力（李讷进入解放军报社时改名肖力——编者注），我可以叫‘小杨’，但是，你不能叫‘小杨’，他比你还大两岁呢。”从此以后，她有时叫我“杨大哥”，有时叫“银禄同志”，或叫“老杨”。李讷身体非常虚弱，神经也非常衰弱，稍一活动就出虚汗，不时表现出烦躁不安的神态。

那时，通讯还不发达，一栋偌大的楼房只有五部电话：江青办公室有两部，厨房一部，大门口一部，我的办公室兼宿舍一部。李讷的宿舍没有电话，但她在解放军报社挂着总编的职务，报社有些重大的事情要请示报告她，她认为重要的事情也要通知报社，因此经常到我屋里接、打电话。由于心情不好，有时她在电话里就跟对方吵了起来。她怕母亲听到打电话的声音，每次接、打电话都把门关上，一讲就是很长时间。江青睡觉以后，我抓紧时间整理文件资料，锁上门睡觉，经常是刚刚躺下，李讷就敲响电铃要到我的屋里打电话。我赶紧全副武装（那时我是军人），穿好衣服，开门说：“请进。”她打电话少则十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有时一个晚上（江青是夜间办公，睡觉时间实际是白天）进来四五次打电话，闹得我也开始神经衰弱，吃安眠药了。我嘴上不好意思说，可是心里烦极了。

后来，我鼓足勇气向汪东兴提出给李讷安一部电话，并把她的宿舍从一层搬到二层。汪很快就答应了，并负责说服她搬到二层去住。李讷同意搬家。我们要给她打扫房间、布置家具、安装电话，于是请她暂到丰泽园居住。李讷走后，我们利用江青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间很快给李讷打扫干净了房间，布置了家具，搬了家。我派人到中南海把新宿舍的钥匙交给她。也怪我想得不细致，应该给她安上电话后再把钥匙交给她。

过了两天，李讷打电话问我：“是不是你找汪叔叔叫我搬的家呀？”我回答：“是我。”“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讨厌我？叫我离你远一点？”李讷又问。我解释说：“不是的，我为了你好。二层只有江青同志和你二人居住，比较安静，你身体不好，睡眠很差，楼下人多，影响你休息。”李讷说：“我明白了，看来你的心还是蛮好的，谢谢你的好意。”我以为她真的理解了我的心，就心平气和地说：“你最近几天能不能回来一下，请你来看看家具布置得合适不合适？电话安装在什么位置？”

这时，李讷火冒三丈地说：“你现在就给我安电话，我回去就用。”我耐心地说：“门钥匙在你手里，开不了门，怎么安装电话呢？要不我派人到你那里去取钥匙。”她一听火气更大了，不讲理地说：“钥匙我不给，门我不开，锁不能搞坏，你今天就得给我安上，这是我的命令。”

“文化大革命”风云变幻，加之各种压力，李讷的性格、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我第一次听到她说出这样不讲道理的话来。我毫不客气地说：“肖力同志，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后代，你现在也是一位高级干部，怎么失态不讲道理了呢？咱们是同龄人，你怎么不尊重别人了呢？”她停顿了一会儿说：“我不讲理了，你看怎么办？”我说：“如果你再不讲道理的话，我就想办法报告主席。”她说：“别，别报告我爸。”我看她的态度软下来了，就心平气和地说：“算了，算了，在你方便的时候请你来一下，好尽快把电话安上。”她答应说：“那好吧。我刚才对你态度不好，请你不要生气，我是心情不好，对不起了。”

李讷的无理我并不怪她。我理解她当时的处境：工作多，压力大，江青不但没有给她更多的母爱，还经常叫她这样做、那样做，她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边缘。况且，她那时已29周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江青对她的婚姻关心不够。由于江青疑心较大，反复无常，谁敢给她的女

儿介绍对象呢？人们对她都是虚与委蛇，敷衍应付，敬而远之，李讷的苦恼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母亲的江青不是关心女儿李讷的身体健康，而是如何控制更多的权力。在她的建议下，李讷先后担任过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

1970年下半年，李讷神经衰弱得非常厉害，身体几乎垮了。中央办公厅领导建议并经毛泽东和江青同意，李讷到了江西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一面休息，一面适当参加劳动锻炼，以松弛神经、促进睡眠、增加食欲、增强体质。

中办五七学校的不少学员都认识李讷，对她很客气、很关心，连队的领导对她也很照顾。但李讷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同大家一起劳动、吃饭、休息，泼泼辣辣，干活不惜体力，不怕脏，不怕累，经常满脸汗水，浑身是泥。她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搞得很好，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几个月后，李讷的神经衰弱大大减轻，睡觉好了，吃饭香了，体质明显增强。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毛泽东和江青接到中办五七学校校长——毛远新的姐夫曹全夫（毛远志的丈夫）的来信，说李讷在五七学校一切都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并在五七学校找了一个男朋友，叫小徐，是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服务员，也在五七学校劳动锻炼，该同志身体健康，精明能干，政治可靠，年龄比李讷小一些，其父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小徐的出身没有任何问题，本人情况比较好，现在他俩感情很好，如果主席和江青同志同意的话，他们近期就可以登记结婚。

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我们不宜干涉。江青看了信以后，闭目不语。因为主席已经明确地表态，即使江青不同意，她也不好提出相反的意见。信在办公室放了好几天，江青迟迟不表态。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问：“曹全夫同志写给主席和江青同志的信你给江青同志看了没有？江青同志批了没有？江西那里还等着意见呢。”我说：“早就给江青同志看了，还没有批示。”汪东兴说：“你在她精神好的时候提醒她批一下。”我说：“好，我马上去提醒。”

我到了江青的办公室，她正在看文件。由于晚上的觉睡得不错，没有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样子。我问：“江青同志，曹全夫同志的信你批了没有？汪东兴同志来电话说，李讷还等着回音呢。”这时，江青用力将手中的文件摔在茶几上，生气地说：“这个李讷呀，对于婚姻大事如此轻率，找男朋友也不事先和我们商量，征求老人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儿大不由爷呀！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随她去吧。”说完，拿起笔来，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个圈。

放下笔，用力把信扔给我并问道：“小杨，你认识这个叫小徐的吗？他的情况怎样？你知道的话告诉我，如果知情不报，你就是犯了欺君之罪！你告诉我。”我说：“我不认识他，我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曹全夫同志是中办五七学校的校长，他介绍的情况是代表组织的，应该相信他的话。”

“对，曹全夫同志既是校长，又是我们的亲戚，正因为我相信他的话，才觉得这个人李讷不般配，两个家庭的情况相差甚远，他们两个人的文化程度相差甚远，职务地位也相差甚远，我不相信他们俩有什么共同语言，能生活到白头偕老。你说呢？”江青问道。

我说：“两个人的感情好比什么都好。当然，江青同志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要达到两全其美也是很难的。心想事成只是一种愿望，在实际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不，不是有

一定道理，是完全正确的，不信，你等着瞧，不出问题才不正常呢。”江青不高兴地说。我想：哪有当母亲的盼着孩子婚姻出问题的呢？

一周后，李讷和小徐高高兴兴地登记结婚了。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双方的家长也没参加。结婚那天，毛泽东派人给李讷和小徐带去一套《马恩全集》作为结婚纪念品。婚礼仪式是曹全夫操办的，请食堂做了两桌便饭，五七学校的几位领导参加，吃了几粒糖，吸了几支烟，就算结婚了，非常简朴。

恩爱的小夫妻结婚后回北京度蜜月，住在丰泽园。可能是从南方回到北京不能很快适应气候变化，加上尚不习惯婚后的生活，李讷经常感冒发烧。江青找茬说小徐身体有毛病，不然为什么李讷老发烧，命令小徐到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的结果是没什么大毛病。

树欲静而风不止。两人的婚姻并未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一天，江青到南海看望李讷和小徐。江青听人说过小徐的字写得不错，就检查小徐的笔记本，看看他的字到底如何。刚开始还夸他字写得的确不错，后来发现小徐的笔记本上记有南海和钓鱼台的几个电话号码（作为毛主席的女婿，为了联系方便记几个电话号码是很正常的），多疑的江青回到钓鱼台后大做文章。

江青说：“他这是想干什么？我看他像一个特务，不然他写那么多电话号码有什么用，应该叫他立即离开南海，也不准他到钓鱼台来，叫他离主席和我远远的，我不想再见到他。”

我为小徐开脱说：“记几个电话号码不能说明什么，为了联系方便，不少人都有一个电话号码本。如果你对他不放心的话，是不是通过组织跟他谈谈。可以告诉他，怕电话号码泄密，只要用心记，不要用笔记，叫他保密。李讷与小徐结婚不久，他们俩的感情不错，如果在这个时候把他俩分开，恐怕不太合适。如果你认为小徐有问题，还是以教育为主，做做思想工作，动不动就采取组织措施，往往效果不好。”

那时，我认为江青十分爱她女儿，小徐是她的姑爷，我替他说说情，江青也就放过他了。我没有料到，江青对我的话不但不参考，反而大发雷霆，她大声训斥道：“你是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职员，你没有任何发言权。我对小徐怎样看，怎样处理，这完全是我们家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你认为他是个好人，有什么证据？我认为他不好，有坐探的嫌疑，我看到证据了，电话号码就是证据。你赶快把春桥同志叫到我这里来，我有事想和他商量，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以后再做决定，这里没有你发言的权利，更没有权利教训我。”

张春桥动作很快，1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钓鱼台10号楼。我把他引进大客厅，就退出来了。他俩都说说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很快就决定把小徐送到石家庄铁道学院学习。

从表面上看，这种决定无可非议，送小徐去学习深造是件好事。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李讷和小徐分居两地，淡化他俩之间的感情，为离婚做准备，这就不可思议了。李讷与小徐新婚燕尔，把小徐弄走，李讷的痛苦可想而知。李讷性格倔强，宁可忍痛割爱，也不再央求她的母亲。从此，李讷和小徐就永远地分开了。

可怜的李讷发现自己怀孕了。由于精神折磨和身体不适，神经衰弱症更严重了，情绪非常不稳定，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整天不出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安眠药用量逐渐增加。同时，她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的惧怕、尊重、不敢多言，转变成不理睬，对她做的事看不惯，对她说的话不想听，有时见面还吵几句。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1972年初“批林整风”期间，江青突然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开刀（也有整汪东

兴之意)，这股风来得很猛。有一天深夜，江青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参观的名义，约了6名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八一厂已是午夜时分，演职员们都已休息。江青命令把他们从被窝里叫起来，召开全体演职员大会。她不讲电影艺术，专讲“批林整风”的意义。主题是讲中央办公厅出了一个大坏蛋，他就是王良恩，是周恩来的大秘书（王良恩不是周恩来的秘书，而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权力大得很，九届二中全会6号简报出笼的责任，他是有份的（这是江青强加给王良恩的）等等。王良恩受不了这种政治高压，含冤自杀。

这天早晨，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难过地说：“真糟糕，王良恩同志受不了压力，自杀了。江青同志起床以后，你报告她一下。”我报告江青以后，她高兴地说：“好哇！这就更说明了王良恩这个人有问题，这叫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此后，批王简报一批接着一批。一天，江青叫我把6期批王简报送到中南海给李讷看。我到丰泽园李讷的住处，看见她正烦躁地在屋里踱步。看到我后不耐烦地问：“你又奉江青什么命令到我这里来。我没有那么大谱，敢麻烦你杨大秘书一趟。”我说：“你这是客气呀，还是讽刺我呀？”李讷用疲倦红肿的眼睛瞅了我一眼，说：“我是讽刺她，不是讽刺你。开个玩笑，何必当真。”我笑着说：“别开玩笑，你妈叫我送给你几份简报看看。”

她接过简报，粗略看了一下题目，就非常生气地大声说：“叫我看这些干什么？！”一下就把简报从窗户扔到院子里，散落了一地。我忙说：“李讷，你不看也别扔到院子里，万一丢几份我可不好交代呀！”“告诉她，以后不要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看，我早就烦透了。”李讷说。当时，我不知道她烦什么：是烦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还是烦江青打倒一个又一个领导人？

三月底四月初的一天，凌晨3点，李讷来到钓鱼台江青的10号楼，要求见江青。江青刚刚睡觉，大门口值班的同志说：“江青同志刚睡下，你现在见她不是时候。”李讷不听劝阻，硬是往里走。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植物神经紊乱，睡眠不好，你是知道的。现在打扰她，今天她就不可能再睡了，她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吃不消。请你现在回去，等她起床后，我报告她，就说你晚上来这里找过她。她如果同意你来，我打电话请你再来，谢谢你与我们合作。否则，我们就为难了。”李讷说：“你怕她睡不好觉，就是不怕我睡不好觉。你叫护士给我几粒安眠药，我立即就走，不给你们找麻烦。”

按说，李讷不能入睡，给她几粒安眠药并不为错。但江青下过死命令：“李讷服用安眠药量太大，她现在又在怀孕期，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再给她安眠药，如果不通过我，私自给了她安眠药，军法从事。”江青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于是，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交代过，没有她的指示，我们不敢给你，安眠药一粒也不敢给。请你委屈一下，江青同志起床后我去请示，请你现在先回去，请你理解我们。”李讷不满地说：“你说来说去还不是怕担责任吗？我不让你们担什么责任，我自己进她的卧室，亲自去求她。”说着就往江青卧室走廊里闯。值班员挡住她的去路，李讷怒斥道：“滚开！叫我进去！”

我看李讷今晚见不到江青是不会罢休的。于是，我就拦住她说：“请你消消气，等一等，我叫护士先进去，把江青同志叫醒。”李讷喘着粗气，坐在沙发上，很不耐烦地等候。大约过了两分钟，护士从江青的卧室出来，说：“把江青同志叫醒了，同意李讷进去。”李讷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她大步流星地进去了。我看了看表，已是凌晨四点。

李讷进去不到10分钟，江青就急匆匆地打铃，叫秘书，叫警卫员，叫护士。我们都不知道江青的卧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跑了进去。江青穿着睡袍，坐在床上，李讷坐在地毯上，两人都喘着粗气。江青大声吼道：“看你这个样子，哪像主席和我的女儿，简直就像一个泼妇，你给我滚出去！”

李讷也气得大声说：“你哪像一个做妈妈的，你的心也太狠了，你对你的女儿都不知道心疼，你还心疼谁呀？向你讨几片安眠药都不给呀，你知道睡不着觉有多么痛苦，你只知道关心你自己！”我是第一次看到她们母女俩反目吵架。

当着我们的面，江青觉得失去了一个做母亲的体面，更觉得失去了一个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伟大旗手”的尊严，对李讷又吼道：“你给我从这里滚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那时，李讷已怀孕七八个月，大腹便便坐在地毯上，喘着粗气，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江青高声地对我们吼道：“你们还看什么，是不是在看我们家的热闹，这有什么热闹好看的，还不赶快把她给我弄出去。”我耐心地对李讷说：“肖力同志，先走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好吗？”李讷说：“不行，不给我安眠药我就不走。”态度很坚决。江青用发颤的嗓音说：“你们把她抬出去，别跟她讲废话。”

李讷个子大，身子重，我们三人哪能抬得动？又叫来两个小伙子，搬来一把宽大的椅子，把她抬到椅子上，三个人抬，一个人搀扶着，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抬到门厅。我们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她才勉强上汽车走了。上车后，她觉得从中南海跑来向她妈要几片安眠药也没有达到目的，回到中南海肯定更睡不着觉。不行，还得想办法要几片。当车开到100多米的拐弯处时，李讷从车上跳了下来，坐在马路边上不走了。司机贾德祥无论怎么劝也不走。小贾没办法，又跑回10号楼把我们叫去。

春寒料峭的季节，凌晨显得格外寒冷。一个孕妇坐在冰凉的马路边上，谁见了都会心疼，何况她又是毛主席喜欢的孩子。李讷看到我们去了，便说：“她心狠，不给我安眠药，你们也不给，你们还真行，真够坚持原则的。今天不给我药我就不走了。”我说：“你现在怀孕，安眠药吃多了对孩子不好，请你回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后，我们再向她请示。她给我们下了死命令，不准我们给你安眠药，对于她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请你理解我们的难处。”李讷说：“你讲得对，我理解你们。可是谁能理解我呢？不给我药我就不走了。”

我们实在没招了，我就跑回10号楼，鼓足勇气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打电话，说明情况，请示怎么办。张耀祠为难地说：“江青同志与李讷同志的关系发展到这种地步是咱们都没有想到的。如果现在我同意给她几粒安眠药，江青同志知道了，怪罪下来，我如何解释呢？如果李讷服了咱们给她的安眠药万一出了问题就砸了。我不敢批准给她，请你劝她回中南海，等天亮了再说。”

我一听就急了：“你不同意给她，她就不走，她在马路上坐久了出了问题就更不好交代了，给她几粒安眠药多好哇，把她打发回去我看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如果江青同志追问责任的话，我和你共同承担。不给她怎么办呢？我是没有招儿了。”张耀祠显得很为难，最后不情愿地说：“那就给她几粒吧。”我说：“谢谢张主任，你已经睡觉了，我还打扰你，真难为情。”张耀祠说：“不客气嘛，你们不是也没睡觉嘛。”我马上叫护士给了李讷三粒安眠药，李讷很快就走了。

李讷走后，江青又呼呼地睡了一大觉。起床后，和往常一样，洗漱完毕，吃了早餐，到办公室看文件，打铃叫我进去，并没有问李讷是怎么走的，反而训斥道：“我告诉你们，我睡觉很困难，睡下以后只有主席有事可以叫醒我，其他任何人都不许打扰我，你还记得吗？”“记得。”我回答。“李讷来了，你为什么还把我叫醒，昨天晚上你犯了一个大错误，竟然叫一个毛孩子到我的卧室大吵大闹，你怎样解释吧？”

我解释说：“李讷睡不着觉，是来向你要安眠药的，根据你的指示我们不敢给她，她就往你的卧室里闯，我们用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拦住。她万一闯进去了，还不把你吓一跳吗？我实在动

员不走她，才让护士把你叫醒的。你批评就批评我吧，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和其他同志没有关系。”江青摇头晃脑地说：“算了，算了，谅你是初犯，今后不准再犯。传达我的命令，从今天起，李讷不准进入钓鱼台，更不准进我住的楼，我不想再见到她。谁把她放进来我就唯谁是问，谁敢违抗我的命令，我就狠狠地处分谁。”

我把江青的命令报告汪东兴，请他通过警卫局通知钓鱼台各个大门。汪东兴听了以后，笑着说：“江青的命令能行得通吗？李讷是主席和她的孩子，她硬往钓鱼台闯谁能拦得住哇？我看行不通。江青的命令我可以传达，行不行得通再说吧，我看主席也不会同意江青这样对付他们的孩子的。”

江青的命令传达到钓鱼台各个大门，哨兵和警卫值班室执行得都很认真。有一天，李讷还真的来到了钓鱼台东大门，哨兵不让进，说这是上级的指示。她说：“我是江青的女儿，我们还没有脱离母女关系，我是来看我的母亲的，谁敢挡我？你们的上级是谁？我去找她！”哨兵没有办法，就把实话告诉她：“这是江青同志的命令，现在不叫你进钓鱼台，我们不敢违抗首长的命令，请你理解。”李讷生气地说：“理解，谁能理解我呀？我看你们谁敢挡我，谁挡我我就跟谁拼！”说着就往里走。这种情况下，谁敢拉她呢。江青和李讷见一次吵一次。江青不止一次地质问我们：“谁把李讷放进钓鱼台的？”我是实话实说：“拦不住哇，哨兵又不能动武。”江青听后，只是无可奈何地叹气，出虚汗。

1972年5月，李讷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当我报告江青时，她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既不问大人小孩是否健康，也不说去看看大人小孩，只是点点头，说：“我知道了。”我故意说：“李讷有了孩子，江青同志当了姥姥了，高兴吧？”

江青面无表情地说：“生孩子有什么可高兴的，共产党员生孩子是很俗气的，孩子应该让别人去生，生儿育女是非党员的事。党员生一个孩子就等于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了一条锁链，生得越多锁链越多，党员生孩子不是喜而是忧。我们家的女儿生了孩子不让他叫我姥姥，叫我姥姥多难听，姥姥就是‘老’了，也不叫外婆，叫我叫奶奶，对主席不叫姥爷，而是叫爷爷。”

李讷生了孩子，精神上有了寄托，高兴得像换了一个人。孩子刚过满月，她就到钓鱼台看我们，还带了不少喜糖。李讷跟我们高高兴兴聊了一会，才去看她的母亲。10分钟左右，她俩一起出来，都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当时，我们对江青很难理解：自己的亲生女儿生了孩子，为什么不高兴呢？

李讷缺少母爱，又没有丈夫体贴，加上孩子拖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维持多久又垮了，而且这一次垮得更厉害。不用说照管孩子，连自己的生活几乎都不能自理。她的儿子很小就送到了幼儿园，由警卫战士接送，接回来后就和警卫战士吃睡在一起。孩子长得很漂亮，聪明，很会说话。

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一个小孩穿着小皮鞋，拿着冰棍吃，就仰着小脸对解放军叔叔说：“叔叔，我不吃冰棍，省了钱我也买皮鞋。”他是想吃冰棍又想穿皮鞋呀。警卫战士用自己的5分钱（新战士每月只有6元津贴）给他买了冰棍，小家伙赶紧接过去，说：“谢谢叔叔。”他舍不得咬，而是用舌头舔着吃，真够可怜的。

李讷病得不能照管孩子，江青是知道的，但对外孙，她不闻不问，更不照顾，小外孙从生下来到长大成人没有得到她任何关怀，小的时候都没有抱过一次。她看不起小徐，也看不起李讷和小徐的孩子。

现在李讷有一个幸福的家，丈夫叫王景清，他身体健壮，忠厚老实，性格憨厚，勤于操持家务。李讷身体不太好，他对李讷很体贴，很关心。夫妻二人恩恩爱爱，过着平常人的生活，中央领导对李讷也很关心。以前，李讷住的地方离合同医院较近，看病比较方便，后来，她的家搬到距离合同医院很远的地方，看病先要坐地铁，再换公共汽车。李讷现在身体较胖，上下车很不方便。中央领导了解这个情况后，给李讷安排了一辆小轿车，不是固定给她的，但保证她用车，解决了她到医院看病交通难的问题。对此，李讷非常感谢组织上的关怀和照顾。

◇ 江青与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儿子，1941年2月在新疆出生。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那时，毛远新只有两三岁，与母亲一起坐牢。1945年7月，朱旦华带着4岁多的毛远新来到延安。1951年，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江青对待毛远新如同己生，精心抚养和培育。

毛远新的中学时代是在101中学度过的。他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后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为哈军工的高才生。1965年毕业，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毛远新到云南防空导弹部队当兵，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操炮手。

1966年9月，毛远新回到北京。毛泽东要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并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文革”的全过程。于是，他去了哈尔滨，参加了哈军工的“文革”运动，并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成了当地的红卫兵领袖。1968年5月14日，辽宁革委会成立，他担任了副主任。以后历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

“文革”期间，他当过3次联络员，一次当周恩来总理的联络员，一次当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最后一次当毛泽东主席的联络员。

由于毛远新在东北和北京都有事情要做，所以，他经常来往于两地。到北京，大多住在钓鱼台江青的住所。他态度和气，平易近人，能与工作人员打成一片。当时我们工作人员对他印象不错，相处得很融洽。有一次，他开玩笑地说：“我教你们一句英语吧，‘三头牛，没有马骑’。”他说的是“非常感谢”，大家被他逗得前仰后合。他每次来到北京，都会把从东北带来的糖果分享给大家。

有一次，他主动提出和我比赛扳手腕。他的右手臂力很大，我输了。我是左撇子，换到左手时，他输了。打了个平手，扳完，我们先是气喘吁吁，后又哈哈大笑。还有一次，他拿着香烟、白酒到我的办公室叫我吸烟、喝酒。因为江青闻不了烟味和酒味，所以我不敢抽烟，不敢喝酒。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吐出了一个个烟圈，对我说：“杨秘书，馋了吧，我给你点着来一支。”我摇了摇头。

江青对毛远新的态度时好时坏。时任江青机要秘书的阎长贵说：“毛远新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时，一天上午，江青看到毛远新，就夸奖起来了，十分高兴地笑着说：‘你是好孩子，留下来，做联络员好，好好做！’”

1968年末1969年初，江青怀疑她居住的11号楼内有窃听器，她没有告诉我们中的任何人，只叫毛远新在楼内各个角落秘密检查。有一天，江青出去开会，毛远新带着手电筒、小锤子、小钢锯，悄悄爬到二楼的顶棚检查。顶棚面积很大，又没有光亮，不好检查，他就拿着手电筒到处走动，到处敲打。我们听到这种奇怪的敲打声都感到很惊愕，我吩咐工作人员，

循着声音去检查。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二楼一间屋内的屋顶上能钻进二层顶棚的进出口没有盖好，随即进入顶棚。他发现了手电的光亮，就大声喊：“谁在里面？”没有回音，只看见手电的光亮晃来晃去。他又大声喊了一声才有了回音：“是我，我在进行安全检查，不要紧张，没有事，你下去吧。”他听到是毛远新的声音就放心地下来了。毛远新检查了两三天，也没有发现什么窃听器。这件事说明江青对我们工作人员都不信任，而对毛远新是很信任的。

江青喜怒无常，有时也表现在对毛远新的态度上。有一天，她从外面回来，一进楼门就问警卫员孙占龙：“现在李讷住这里吗？”孙占龙答：“这几天李讷没住这里，毛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气呼呼地说：“他住我这里干什么？”

那时毛远新在江青的住处暂住，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也很自觉，从来没有给工作人员添过任何麻烦。他主动到钓鱼台机关食堂，和职工一起排队买饭，没有任何特殊。有一次，他回来晚了，机关食堂已开过饭，江青的厨师程汝明就用江青吃剩下的米饭炒了炒，用江青不吃的鸡蛋黄做了一个鸡蛋汤。按理说，孩子回家晚了，没有地方吃饭，吃一点大人的剩饭剩菜是情理中的事，况且就是占江青的便宜，这便宜也太小太小了。可江青知道后，却把程师傅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并责令他在党支部会上作自我批评，逼迫他作检讨，并下令说：“下不为例！”

程师傅不服，拒绝写检讨。我怕因小失大，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力劝他写一份不疼不痒的检讨，应付一下。但是程师傅仍然不服，不写检讨。江青催我要，程师傅坚决不写，把我夹在中间，三个人都下不了台。我耐心地对程师傅说：“程师傅，你一点错误都没有，做得很对，你比我更了解江青这个人，好汉不吃眼前亏，看在主席的面子上，受点委屈就受点委屈吧，你不是也经常这样劝过我们吗？如果你觉得不好写，我替你写，你再抄一下，我递给她，行不行？”程师傅这才勉强答应。

江青拿到检讨后，把它举得高高地说：“我要是不叫他写这个检讨，他记不住。如果他今后再犯同样的错误，我就拿出这份检讨来示众，那就是重犯，你们知道吗？重犯是要罪加一等的！程师傅跟了我这么多年，他没有犯过错误，这次的错误犯大了，不写检讨就别想过这一关！”

毛远新在毛主席和江青身边长大，对他们有感情也是很自然的。毛远新有时写信称毛主席为爸爸，称江青为妈妈。在一般人看来，这也无可指责，但毛主席批评过他这样的称呼。程师傅对我说过：“有一次，主席批评毛远新，‘你的亲生父亲是毛泽民，你的亲生母亲是朱旦华，你的继父是方志纯。你怎么叫我和江青为爸爸妈妈呢？人长大了，也不要六亲不认嘛。’”江青却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在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也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什么。”

有一次江青在谈到主席和她的家庭时对我说：“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这话不假。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个家庭小有小的困难，大有大的难处。像我们这样一个家庭，主席几任妻子的孩子组成的家庭，毛远新也在这个家庭之中，要想搞得很和谐，不使主席分心或少分心，做到都没有意见，是很难很难的呀，我尽力去做就是了。”她还说：“一般的家庭是严父慈母，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特殊的家庭，与一般的家庭倒过来了，是严母慈父。我对孩子们无论是在思想上，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要求是很严格的，批评多些，表扬少些；指责多些，对话少些；主席对他们却比较宠爱和宽松。所以，他们有些心里话愿意向主席讲，不愿意向我讲。远新这个孩子从小就很聪明，爱学习，头脑清醒，听大人们的话，对他不用多操心，我们操心的是李讷的工作、身体和婚姻问题。”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